



政治力與我國安全

王榮川

提 要

- 一、當前我國所面臨的安全威脅的順位雖為軍事，經濟，但關鍵實為政治。而政治安全就是人民對既有的政治價值與政治制度的認同，並對可能威脅此一價值、制度存在的因素希冀加以排除。
- 二、維護政治安全除了傳統的軍事力外，政治力更是不可缺。
- 三、政治力的體現係透過內在建構與外顯力形鑄而成，涵括政治文化、政府的素質、國家目的達成、外交的能力、國家的競爭力。
- 四、兩岸衝突的長期未能消滅的結構性癥結，在於政治體制的差異。
- 五、維護我國政治的安全應先認清敵我政治力的優勢、劣勢、威脅來源，並設法衝破困境尋找或創造機會。

關鍵詞：政治安全、政治力、政治文化、國家競爭力

壹、前 言

一般研究戰略或安全問題的專家或學者大多聚焦於軍事與經濟層面，而將政治列為次要，甚至僅是聊備一格。若從國際環境與現實看，也許是反映世人關心程度。但對我國這種情境特殊的國家而言，對政治的安全不但不能忽略，還要強化，因為我們當前所面對的威脅順位雖是軍事、經濟，但關鍵仍

在政治安全，換言之，是政治制度政治與價值的維護或攻守。

其次，就國家戰略的國力意涵而言，政治力如同經濟力、軍事力，它是國力的一環。從廣義來說，政治力是指一國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從狹義來說，是指一國的施政的成效，或是一國政府的決策能力。從戰略的宏觀看，政治力一則是指一國整體力量在國際社會的影響；而從微觀看，政治力則是

國力的一種，與軍事、經濟、心理、科技等力可等量齊觀。^{註一}

若從我國當前處境及從兩岸的優勢與劣勢比較，我們會發現：雖然從實力原則看，受中共有形的力量，尤其經濟力與軍事力的影響，我國長期以來，在國際外交上一直受對岸中共的打壓與圍堵，尤其近幾年因中共經濟改革與發展卓然有成。而在經濟大餅的誘惑下，使我國外交似乎更處於較不利的地位。而外交卻也是形成政治力的重要的一環，自然不許我們稍有疏失。然而外交固然重要，卻也只是政治力的一部份。從無形或軟國力的角度看，民主的鞏固、提升與經濟的成長、繁榮，才是我國真正可長可久、強而有力的生命力。而二者對我國而言卻都涉及兩岸關係，而此既是政治問題，也是政治安全。因此，這也是作者敢選以此題目作為拋磚引玉研究的基本動機。

貳、國力中的政治力

無論政治是戰爭的目的，或戰爭的指導，國家要避免戰爭或達到戰爭的最高的境界——不戰而屈人之兵，就必須以提升國家的政治力為先決條件。鈕先鍾說：戰略的最高境界應是不用國力而能維護國家利益達到國家的目的。^{註二}而政治力從廣義言，是國家整體力量在國際社會的展現。狹義則是涵括內政與外交（外政）；內政關涉一國政府在其管轄範圍為內涵，就規劃其公共生活之基本決策行為，結構上涵蓋中央與地方政治。

而外交（外政）或對外政策是指涉、規範一國與其外在世界之決策行為。簡言之，內政的主要影響因素，仍來自國內勢力，而對外利益雖是經由內部意願凝聚形成，並由全體國民承擔，兩者無法分開。^{註三}這也是傳統戰略研究或較學者所認定的政治力內涵。

一、「綜合國力」中的政治力

中國大陸學者一般稱國力為「綜合國力」（Overall National Strength or Comprehensive National Capacity）。認為「綜合國力」是指主權國家經濟、軍事、科教、資源等方面的總和。或認為綜合國力即一國具有影響其他一國或幾國的綜合實力；^{註四}或指主權國家生存和發展所擁有的全部實力——包括物質力和精神力及國際影響力。並將政治力與外交力列為七大國力的範圍，即政治、經濟、科技、國防、文教、外交、資源等七項國力。^{註五}其中政治力是指國事，是綜合國力的核心。其內容包括政權性質、政治體制、政治制度、政治目的、政治思想、內外方針政策、政府素質與領導組織、決策能力、國民凝聚力，以及國際政治環境等。而外交力是指一個國家在對外活動和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其內容則包括外交政策、對外活動、處理國際事務的立場和態度，以及國際貢獻能力等。除此之外，學者亦認為從構成綜合性概念的國力非線性動態大系統看，國力包括具有物質形態的硬實力，也包括精神智力形態的軟實力。^{註六}

二、國力評估中的政治力

註一 過去研究戰略及國力，或官方的國家安全體系的安全政策，總區分為政治、經濟、心理、軍事四項。現今則擴增為包括外交，科技在內等五項；而政治一項始終是首要項目。見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國防報告書（國防部「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民國91年），頁68。本研究所指涉政治力仍涵括內政與外交兩項。

註二 鈕先鍾，戰略研究入門（臺北市：麥田出版社，1998年），頁162。

註三 洪丁福，國際政治的理論與實際（臺北市：國立編譯館，啓英文化公司，2000年再版），頁158-159。

註四 高金鈿、顧德欣，國際戰略學概論，頁77。

註五 見黃碩鳳，新綜合國力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門洪華 黃福武等譯，國家實力評估：資源績效軍事能力（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頁3。

註六 黃碩鳳，新綜合國力論，頁5。

美國戰略學者克萊恩(Ray S. Cline)所強調的國家策略與國家意志，則與政治力有密切關係。如果基本體積(人口、領土)、經濟能量與軍事能量三者等同於Joseph Nye的硬實力(hard power)，則國家策略與國家意志二者應等同於軟實力(soft power)。所不同的是，Joseph Nye認為軟實力係硬實力的延伸和補充；而Cline則以二者相乘關係，突顯國家策略與國家意志的重要性。他以國力＝(基本體積＋經濟能量＋軍事能量)×(國家策略＋國家意志)的公式，說明「如果國家沒有一貫的國策，或是缺少實現這種國策的堅強國家意志，則構成國力的重要具體因素，也會減少到形同虛設的程度。」^{註七}

國家戰略的政治戰略首在建立政治力。傳統的國力評估根據兩項基本類型，一是國家的有形力量，二是國家的無形力量。前者有形力量包括自然資源、土地面積、人口、工業生產、貿易和軍事力量。後者無形力量則以國際社會的形象，政府的施政效率以及民心士氣為主。^{註八}而後者即是我們所探討的政治力。設若將戰略意涵的政治簡化為狹義的內政與外政，則政治力係是經由內政與外政的效益而產生的力量。而此兩種力量是相加也是相乘；更重要的是，內政為外政的基礎，所謂「外交是內政的延長」。

這種政治力與戰略學者克萊恩所說的「認知國力」(Perceived Power)很相近，或者

是如法國當代政治學者雷蒙·艾宏(Roymond Aron)所指廣義的權力是「執行、製造或毀滅的能力」，而此權力若用於國際關係，則是指「一個政治單元迫使其它政治單元接受其意志的能力」。^{註九}這種政治力即可迫使敵人或潛在的敵人在做侵犯或勒索行為之前重估自己的勝算能力。

參、政治力的體現

戰略研究學者為了使研究更「逼近」(close to)科學，雖也盡力採量化或公式的模式，以顯示精確性與客觀性。但克萊恩也承認「運用指數來計量價值並衡量實力」是「主觀的，從某個角度而言也是一種武斷的判斷」，即使所選擇的定量也僅做概略的衡量。「因為有許多變數並非是真正可以定量的」。^{註十}而政治力的研究亦是涉及諸如文化等抽象因素殊難建立客觀模式或精確數據已為論述基礎但本文仍希望跳脫傳統過於簡單的「內政」與「外政」(外交)概念，而選擇學界接受的(如政治文化)或跨科際的(如國家競爭力)概念做為分析項目。

一、內在的建構：政治文化

由於政治文化是人類政治行為的潛在原動力，它涉及人民對於政治系統的基本要素集體態度取向。^{註十一}它是經長久歲月、環境所形成而暫時難以變動(雖亦會受內外社會環境衝擊而有社會化的效應)。就發展中國

^{註七} Ray S. Cline著，王洪鈞譯，一九七七年世界國力評估——列強策略遊動演算書，(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67年，五版)，頁220-221。另根據克萊恩1979年的世界各國國力評分表顯示，臺灣當時的整體國力是49分，排名為12；而中共是83分，排名為7。若僅就軍事力的評比，分數是12，在亞洲國家中，除了中共外(41分)超過其他國家；在世界排名也在十名之內。見「80年代世界權力區及美國外交政策」(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2年)，頁166-168。

^{註八} 蔡政文等著，我國對外政策及行動取向(臺北市：業強出版社，1993年)，頁21。

^{註九} 參見雷蒙·艾宏所著，國與國之間的和平與戰爭，頁38。

^{註十} Ray S. Cline著，1980年代世界權力趨勢及美國外交政策，(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2年)，見「導言」，頁1，及第一章，就政治結構衡量國力，頁16-17。

^{註十一} Walter A. Rosenbaum著，陳鴻瑜譯，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臺北市：桂冠圖書公司，民國73年)，頁-2。

家發展成效觀察，看出政治文化與國家政治興衰有密切關係。比如有人認為日本文化的一個顯著的特點是「開放」，能引進外來文作為自己的營養；另一特點是具彈性，故能包容各種外來文化。^{註五}此文化轉入政治層面，形成近代日本明治維新的社會的驅力。史學者認為日本維新約在晚清自強運動之時，但日本能在20年中致富強，一則是日人於鎖國之前，已與西歐文明約有100年之接觸，對日人的思維與生活已有影響；一則是日人對維新的一心一德。反觀中國，自利瑪竇以後與外國杜絕幾乎200年。直至鴉片戰爭前後西學始再東來。^{註六}此時雖有少數政治精英洞悉國家衰弱與西化的關係，但多數朝野精英卻對國際情勢與西方科技發展均一知半覺，至於一般民眾則更是茫然無知。因此，若從文化人類學的本土運動(nativistic movement)的觀點看，日本受外來優勢文化衝擊，終能採積極反應，而有明治維新的國家快速富強的成效；相對的，中國亦在同時受外來強勢文化衝擊，雖亦有戊戌變法之反應，但終以百日不成而結束，而此亦驅使孫中山先生不得不採革命手段以終止滿清王朝政權主要緣由之一。何以中日差異如此大？文化是也！此所以嚴復認為：康梁失敗的關鍵是在新政之前未有新文化，而新文化則需長期培養。^{註七}而此即是本文另闢蹊徑地從政治文化探討政治力的動機。

(一)國家的認同

人民對國家認同程度，即是國民向心

力的檢證。勞倫斯哈瑞森認為如果信賴與認同不夠，政治分裂、抗爭獨裁政體均可能出現。^{註五}

而認同就是一國國民對歸屬一個國家的認識。對所屬國家的感情，也就是愛國心以及對所屬國家事務的支持態度。顯然的，一個國家的人如果不認同他所歸屬的國家，只認同一個部落，一個地區，一個宗族或一種宗教，他就不會愛這個國家，不會對國家中央政府投入支持。美國學著者白魯洵認為中國人不但沒有其它國家(如第三世界國家)的認同危機，反而相當以自己悠久的文化自豪，並以作為中國人為榮；即使移居外國，亦始終認同中國，並希望後代子孫也要維持這種認同。白魯洵說：儘管中國近百年來遭受了不少的苦難和挫折，但是中國人的驕傲卻未因此而減低；相反的中國人始終認為他們是世界最優秀的民族。^{註六}

旅日名藝人翁倩玉在最近一次接受專訪時就表示：一直以身為中國人為榮，並認為這與父母的教育有關。他說：「父母還叫我要有自信，一定不能忘記母語；不能忘記自己是中國人、臺灣人。」^{註七}不過，也因為強烈的認同帶來許多負面的影響；特別是到了中國近代與西方文化接觸時，民族的優越感不僅忽略外在世界的變遷，連應有的國際禮節都渾然不知，以致當西方人首度來到中國訪問時，便被看做蠻夷之人而嚙閉門羹。而在19世紀，中國皇帝一再敕令各國使節一定要行三跪九叩的大禮。^{註八}這種「失

^{註五} 要修補中日文化橋樑，亞洲週刊（香港），9/1，2005，頁19。

^{註六} 汪榮祖，論戊戌政變失敗的思想因素，「中國近代的維新運動變法與立憲」研討會論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民國70年8月），頁35。

^{註七} 汪榮祖，論戊戌政變失敗的思想因素，民70年，頁41。

^{註八} Lawrence E. Harrison 著，黃葳葳譯，強國之路——文化因素對政治經濟的影響（臺北：正中書局民國83年），頁18。

^{註九} Luian W. Pye 著胡煜嘉譯，中國人的政治心理，（臺北：洞察出版社，民國77年），頁41。

^{註十} 黃菁菁，「謹記父母，教誨從未忘本」，中國時報（民國95年1月1日），A5版。

^{註十一} Luian W. Pye 著胡煜嘉譯，中國人的政治心理，頁42。

禮」是否與爾後外國的一連串衝突事件有關，則是有待考證，但最大的影響可能是這種民族的優越導致對外來優良文化的認同與接納程度。故有學者認為中國政治文化重虛榮，阻撓中國人虛心向西方學習，導致一敗再敗。^{註一}

(二)對政治與從政人物的認知

這是指人民對於政治系統的基本要素的集體態度取向；或一大群公民如何評價他們的政治制度和官員。^{註二}社會大眾對「政治」、「從政人物」的看法、態度對實際政治也有重大的影響。傳統中國人對政治都持負面的看法，視政治為黑暗、齷齪，而以不涉入政治為清高；加上民國以來，政爭不斷，以致政治變成「權力鬥爭」的代名詞。

西方通常稱從政人物(「Politician」，或譯為政客)是指從選舉產生的公職人員，並不包括依考試任用的文官。其次美國雖建國只有二百多年，但傳統上人民卻相當尊重他們的憲政體制；他們相信憲法所設計的政府是合法而適當的；他們也許對尼克森總統感到失望，但不會要求徹底改變總統制；他們也許批評國會或法院，但他們尚無準備要另創其他機構。^{註三}G.Almond & S.Verba亦認為：美國人和英國人常常為他們的政治體制、社會立法、國際聲望而自豪；德國人則很少表示其政治系統而驕傲，而集中在為其經濟，個人品德，科學和工藝的成就而驕傲。^{註三}

何以社會對政治、從政人物的看法會對實際政治有影響？主要是因為一般人對之有好感，良好態度，則對政府權威的運作就能比較順利，同時較能吸引社會優秀人才從事公職。從政治戰略的角度看，國人若能對政治功能持肯定態度，從而以直接參與政治(如參加公職人員選舉)，為民服務為榮，或以間接參與政治(如投票)監督政府為天職。如此朝野上下，關心政治、支持政府推動政治發展，才能展現權能區分的政治效能。

(三)對憲政的認知

政府權力運用範圍合於社會大眾的願望，政府權力運用自然就順利而不需要借用合法的武力，以強迫人民遵守。在歐洲昔日君主專制時期，政府權力無所不管，形成人民不滿與反抗的心理，致產生管得越少的政府就是好政府的政治思想。像我國在農業社會時期即崇尚道家老子的「無為而治」，即是不主張管得太多、太廣。但在處於今日工商業及資訊發達的民主國家中，政府的職權大小；特別是行政機關已不再是應管得多或少的問題，而是其真正的管理權力範圍完全由民意所決定。而此即關係憲政的精意。

而極權國家雖時時宣稱一切為人民，處處以人民為政治符號，諸如人民共和國、人民政府、人民解放軍。這種政府確也完成許多巨大建設，如中國近年完成三峽大壩的建設^{註三}；尤其是與軍事有關的重工業及核

^{註一} 劉平鄰「中國文化研究的各種方法：百花齊放百家齊鳴」，中國大陸研究方法與成果學術研討會(政治大學國關中心，2003年4月1-2日)。

^{註二} Walter A. Rosenbaum著，陳鴻瑜譯，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臺北市：桂冠圖書公司，民國73年)，頁2。

^{註三} Walter A. Rosenbaum著，陳鴻瑜譯，政治文化，頁3。

^{註三} Gabriel A. Almo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 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U.S.A) p.102-3.

^{註三} 筆者在2002年7月應邀赴中國大陸武漢大學參訪時，私下徵詢該校曾參與三峽大壩建設的文史工作的學者(教授)的觀點，該學者認為「大壩建設是政府既定的政策」，學者並無置喙餘地；至於「建大壩的好處在哪，現在看不出，但壞處現在已出現了」。

能航太工程，但因決策並非出自民意，甚至違背民意。因此，所有極權國家都得依靠強大武力才能執行其政策，顯示其權力運用範圍未獲大眾支持。故民主國家的政府的決策因要經過民意機關辯論、表決通過才能執行，外表看起來缺乏效率，但因有堅強的民意為基礎，反而能發揮上下一心的功能，就長程而言，其所產生的政治力卻勝過極權國家。譬如二次大戰中，看似效率極高的德、意、日等法西斯政權，終究還是敗於英、美等民主國家。而在二次大戰後以蘇聯為首的東歐共產極權國家，終於擋不住西方民主國家和平演變的力量，而逐一土崩瓦解。顯示缺乏民意基礎的政府，雖擁有強大的軍經硬實力，最終亦難逃覆亡命運。

(四)因應政治次級文化的政策

依前述，政治文化大致屬於某一國家所獨特而普遍具有。但如深一層研究，一個國家的全體人民的政治心理面並非完全一致，也就是同中有異。換言之，一個國家內的人民，會因為種族、宗教、教育、職業、經濟收入、語言、思想觀念、政治地位不同，而有不同文化差異的顯露，這種差異的文化，稱為次級文化(Sub-Cultures)。

由於次級文化的因素，在國內自然形成各次級文化集團。有些國家（如美、英兩國）雖存在許多次級文化團體，但大致還能異中求同地融和成一致的政治文化；但有些國家（如法國）則因各次級文化集團在政治堅持各種主義，致形成長久的政局不安甚至引發社會衝突。^{註四}由此可見，類似族群等次級文化雖可能形成不同的社會階級，但這

種次文化或是發展成為政治社會的正面「文化熔爐」，或是成為負面的「不定時炸彈」，則與一個國家政府政策取向有相當的關聯性。

(五)政治精英的影響

雖然政治組織或政府的健全是建立政治力的重要關鍵。^{註五}但有些學者認為一切良法美意的實現與典章制度的運作成敗，領導者才是關鍵。^{註六}

尤其，對亞非新興國家而言，在未完全走向政治制度化的過程，政治領導層的重要性可能重於制度，至少二者是同等重要性。社會心理學者亦相信「英雄造時勢」的說法，國際關係學者則認為，「領導者不能無中生有地創造權力，但是能動員未經使用的國家創造活力」^{註七}。傳統政治發展理論學者曾認為一國經濟社會發展在達到某一定程度後，因溝通增加，人民受教育機會增加，社會動員增加，人們在政治上會進一步要求制度的開放和參政的機會，因之而導致民主政治的產生。但此一理論經驗證結果，卻不呈線性的關係，也就是社會經濟發展並不能保證民主政治必然出現。故政治學者經努力搜尋中介變項，發現精英應該才是社會經濟發展與民主化之間的一個重要中介變項。此外，政治學者即有一派專注於少數決策者或有影響力者的行為。他們認為：一切政治系統，不論其形式為何，都可分為兩個階層：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而統治者，也就是實際行使權力者及對被統治具有實質影響者，即稱為政治精英(Political elite)。

德國學者羅伯特米契爾斯(Robert

註四 蔡筱穎，「族群融合問題終於浮上檯面」，中國時報，民國94年11月18日，A14版。

註五 Samuel P. Huntington 著，江炳倫等譯，轉變中社會的政治秩序，（臺北市：黎明文化公司，民國70年），頁1。

註六 Steven J. Rosen. & Walter S. Jones 著，林郁方等譯述，國際關係（臺北：正中書局，民國78年，初版），頁212。

註七 Steven J. Rosen. & Walter S. Jones 著，林郁方等譯述，國際關係，頁213。

Michels)在其主張的「寡頭統治鐵律」中說，任何的組織不論在意圖上是如何的民主，最終還是由一小群精英來統治。^{註六}一般學者爲了分析方便，通常會將精英區分爲執政精英與反對精英；執政精英是指那些在政府與執政黨中最上層的領導者，包括國家元首、行政首長、內閣閣員、主要的立法領袖、高級官僚，以及黨組織的高級的幹部。反對精英是指反對政府或執政黨的領袖，包括組成政黨或運動與執政黨競爭的領導者，或反對政府但並未加入政黨或運動的社會領袖。^{註七}

但精英並不是專指那些政府在位而負責決策者，尚包括那些對政治最具影響力者。至於精英對政治影響力有多大，一般而言，在任何國家，政府的任何政策倘爲大多數精英堅持反對，則就很難順利地執行。因爲精英通常擁有較佳資源（如知識、財富），並利用其地位（如學者專家、宗教領袖），透過媒體對民眾的態度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孟子說：「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註八}「巨室」是指昔日的賢卿大夫，也就是今日的政治精英。即政治領導者處理國政的基本原則是，不能與人民所敬慕的政治精英的價值相衝突。因此，一個統治能力強的政府，除了本身是精英所構成，也是與精英最佳溝通者，而在現代化程度高，功能分化程度也高的社會中，政府的決策系統即應輸入各種集團的需求(Demands)與支持(Supports)，這其中即顯示精英與民眾的影響力。

白魯洵比較大多數發展中的國家，發現20世紀的中國政治發展落後的原因是：政

治領袖缺乏政治想像力和創造力，以及知識份子被排除在政治圈外。他認爲民國以來，中國政治權力一直掌握在一群現代化程度很低的人的手中；他們或多或少都具有反智的傾向。知識份子和專業人才始終被拒於權力核心的門外；或者頂多擔任一些位高權輕的職位；他們影響所及仍只限於非政治性的事務。而當政者對知識份子表面上積極延攬或禮遇，其目的只是希望知識份子能夠自動自發，快快樂樂地置身政治圈外。而統治階層一旦能讓知識份子乖乖站一邊，如此跟一般大眾比起來，他們就自認本身聰明才智無人企及。^{註九}由此可見，中國近代雖受西方文化衝擊，卻未能像其他發展中的國家，順利現代化或西化。其關鍵因素即在知識份子始終無法進入權力核心。相對其他亞洲發展中的國家或原爲列強殖民地獨立新興國家，卻大多能順理成章地完成政治現代化；主要是這些領導現代化的政治精英大多爲知識份子，且多曾受西方文化洗禮，如日本維新時期的伊藤博文、印度的甘地、新加坡的李光耀、馬來西亞的東姑拉曼。而中國的孫中山先生只是在推翻滿清專政、建立民主共和後，僅是短暫執政即不得不離開權力核心，此後中國即陷入軍閥，軍事獨裁，一黨專政的政治宿命。

二、外顯的效應(efficacy)

在戰略研究領域中，分析國力時對硬國力因其大多可加以量化，故稱爲可感知的國力(Perceived Power)。但對政治力則大多以抽象概念與質化分析爲主軸，雖然所得結論因較缺精確性，可信度自然難與硬國力相提並論。但處於後行爲主義應然(ought)與實

^{註六} Michael Roskin & Rbert L. Cord 著，劉后安、洪聖斐等譯，政治學的新世界，頁88-89。

^{註七} 吳劍燮，「領導精英與臺灣的政治民主化」，東亞季刊，第二十四卷，第一期，頁34。

^{註八} 孟子，離婁篇上。

^{註九} Lucian W Pye 著，胡煜嘉譯，中國人的政治心理，頁31-40。

然(is)並重的今天，歷來的政治研究者與戰略分析家都已不敢忽視它的影響與作用。以下試將一般評析政府或政治能力的標準歸納作為政治力的檢證。

(一)政府的素質：廉能與民主

美國學者摩根索即將政府的素質列為國權力的重要因素，他認為「外交政策縱然設計最佳，由最佳專家執行，且可憑藉豐富的物質和人力資源，可是若沒有優良的政府可資信賴，結果仍將一無所成」。^{註三}但論及政府的素質，則涉及政治組織功能與決策能力效率，則就顯得較為錯綜複雜。不過，一個公正廉能的政府，還是被公認為最佳的政府，也是最具政治力的政府。1993成立的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是國際上專門致力抑制貪污腐敗的國際性非政府組織，其數據現今常被引用作為檢驗政府素質的指標。在亞洲國家中新加坡始終名列前茅，這也是新加坡資政李光耀所自詡的治國原則「廉潔的政府，有效率的民事服務」真實驗證。^{註三}

國際間亦有測量各國民主指數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組織。我國近年來，尤其自政黨輪替以來，在「公民權利」及「公民自由」已進入完全民主國家的程度。以2006年世界各國自由度調查報告(Freedom House in the world 2006)為例，臺灣與歐美等其他49個國家並列為全球民主與自由度最高的國家。相對的，中國大陸則被列

為「不自由」國家。^{註四}

民主廉能雖可做為檢驗政府素質依據，不過，政府的公正廉能與否，與政治的民主與否並無直接關係。換言之，民主體制並不能確保有公正廉能的政府；極權政治更不能保證公正廉能。所不同的是，民主體制具有防腐的功能；因政府在位者去留操之在人民手中，人民除了可藉選票直接或間接影響政府的決策，並能透過民意機關、輿論等力量制衡，及時防制政府趨向腐化無能或專制獨裁，而使政治有逐漸清明的可能；而極權國家如今日僅存的共黨國家，雖為了生存在經濟體制改採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在法制上亦有民意機關，但都只是橡皮圖章；司法亦是只打蒼蠅不打老虎；而大眾媒體則仍為黨意或權威領導的傳聲筒。因此，在此一黨專政且為人治的政治社會系統中，政治的良窳缺乏法制化的制衡機制，除非執政者自覺自清，人民對之實無能為力。

雖然世界上並沒有一個完全公正廉能的政府，正如世界並沒有一個十足民主的國家一樣。不過，從現實政治觀察，愈是接近此一標準的政府，它所受人民的支持程度就愈強、愈久。

(二)國家完成目標的能力

國家能力是指國家機關完成政策目標的可能性；質言之，是指國家是否有能力去型塑目標，同時建構與執行策略並完成目標。^{註五}儘管區域整合形成諸如歐盟等超國

^{註三} Hans J. Morgenthau著，張自學譯，國際政治學，頁205。

^{註三} “透明國際”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其總部設在柏林，每年會對各國政府實施評比並公佈「國家清廉度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簡稱PI)排名。根據公佈的2006年度清廉指數排行榜顯示，芬蘭、冰島和紐西蘭並列為全球最清廉的國家，而海地居排行榜末位。中國大陸從2005年排名第78大幅躍進到第70名，香港排名第15、澳門排名第26，臺灣則從2005年排名第32後退到第34。“腐敗導致一個國家的貧窮。”“透明國際”組織主席拉貝爾說，“數十年以來，各個國家從立法和制定法規方面採取了一系列反腐敗措施，但是今天的結果讓我們看到，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還要做更大的努力才能減少腐敗。見「中國經濟網」。另見高希均，新臺灣人之路（臺北：天下文化出版1998年），頁119。

^{註四} 見info@freedomhouse.org

^{註五} 王義桅，國家能力途徑與中國經濟改革，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第五十九期，頁2。

家組織，但參與此類國際組織基本上仍是植基於國家利益；絲毫不會動搖國家存在的價值。研究全球化學者也不得不承認，國家在「全球化」的趨勢下，政府雖無法簡單地為自己的國民決定什麼才是正確或適當的，但民族國家仍是世界主要政治單位。^{註五}也就是說國家存在有其不可取代的功能，是無庸置疑的。因此，早期學者所探討、思考國家存在的目的，較屬功能性；現代戰略學者大多強調目標，較屬現實性。雖然國家的目的或目標，會因時空轉換而調整。但從國力的角度看，衡量現代國家的政治力，至少大致上應包括下列五項：^{註六}

1. 國家安全：國家必先求生存，後求發展。因此，維護國內全體人民的對外安全，免受外來力量的欺凌、壓迫，就是政府的首要任務。所以一個國家必需有國防、外交政策。像我國漢、唐時期受人稱讚原因之一，就是國勢強大。滿清積弱，備受列強欺凌，自引起國人不滿。

任何國家都將安全列為政府首要任務，失去安全其他的目標都成為空話。從國家利益來看，安全即是國家最重要的利益，戰略學者並視之為生存利益(Survival Interest)。

安全目的對敵人環伺下的小國，更突顯重要性，中東的以色列，亞洲的新加坡，由於政府重視國防安全，人民對國家有信心，向心力也強。

2. 國內秩序：一國的內憂和外患本有相當聯鎖，安內攘外亦有密切的關係。而一個完全無力維持社會秩序政府，就等於讓人民處於無政府的狀態。這種政府人民自然會唾棄它。政治學者韓廷頓認為新興國家應把秩序看得比自由重要。他說：「人類可以無自由而有秩序，但不可能無秩序而有自由。」^{註六}從歷史上看，有秩序者為「治」，沒有秩序者為「亂」。國家能保護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財產，是人民建立、支持國家的主要原因。因此，一個國家發展民主，首在建立政治制度，也就是奠定法治的基礎。研究政治發展的學者對民主浪潮的推進並不完全持樂觀的態度，主要是一些發展中的國家在轉型過程中，因政治文化上未具備，以致雖在短期間躍據民主殿堂，但在不久即陷入失序及無效率，以致讓一些獨裁者如二次大戰前的德國的希特勒，或後冷戰的如秘魯政治強人的藤森，^{註六}運用民主選舉取得政權，再藉此權力實施一黨專政或個人獨裁。故發展中的國家如何在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中，既維持秩序又能民主本質才是民主鞏固的關鍵。

3. 社會公道：國家應提供人民公平合理的生活方式。一個良好的社會，必須消除不公道的事實。政府應維持何種公道，各時代各國人觀點不同，且都因時而異。加上因人類個體差異形成各有一套公道的標準。因此，政府有制定標準的立法機關，及判定公

^{註五} 見沈宗瑞等譯，全球化衝擊(Global Transformations)，（臺北：韋伯文化公司，重譯本，2004年），頁578，585。

^{註六} 歷來政治學者的相關著作，大多會探討國家的目的。如Locke(1632-1704)，Adam Smith(1723-1790)，Holtzendorff(1820-1889)，Laski(1893-1950)。本文所陳列國家的目的項目及內涵大致參考C.E.Merriam的”The End of Government”，ASPR, vol.38, no.1(February, 1944) pp.21-40。

^{註六} Samuel P. Huntington著，江炳倫等譯，轉變中社會的政治秩序，頁5。

^{註六} 1990年藤森以黑馬之姿贏得秘魯總統大選。在兩任十年的總統任內，他的表現引起很大爭議。1992年他解散議會，開始走獨裁統治。2000年下臺後爆發他在任內涉及貪瀆，及其他種種不法情事的醜聞。而於該年11月流亡至日本。2005年11月6日，他以觀光客身分飛抵智利，宣佈將返回秘魯首都利馬參選2006年總統大選。中國時報（民國94年11月8日），A5。

道的司法機關，復有維持公道的最後公權力。縱然政府維護社會公道的能力難盡人願，但政府依然為公道的化身。當社會感到不公平的人愈多，所引發的不滿情緒，往往會形成政治不安，而革命或叛亂活動即乘虛而入。而公道的最高境界是司法的獨立；但從政治現實觀察，這是一種難以完全實現的理想；即使首創以三權分立為總統制基礎的美國，也難以維繫司法真正的獨立。因為在總統制的行政權獨大的體系下，涉及總統的政治弊端有時反要藉助第四權的輿論才得以伸張，尼克森時期的水門案件即為顯例。

4. 人民權利：人民權利的保障為民主政治的基礎。傳統上，沒有任何國家或國際組織之權力能駕凌在各國主權之上，從而使得一國在其國家領域內可以制定各種制度，法規而不受任何干預。但隨著科技革新，通訊與交通的發展，突破了時空限制，而產生地球村效應；同時挑戰了傳統的主權與國界觀念。尤其是人權的議題與文化；一般從原本是低階政治議題逐漸外溢到高階政治。人權普受重視而有「人權高於主權」或「人權超越主權」觀念的形成，不但挑戰「人權是內政問題」的說法，且因人權的尊重與否關係政權的穩固性與合法性，使人權躍升為軟國力(soft power)。^{註四}

一個國家通常在和平時期，人民權利應有充分的保障；戰時或危急時（如911恐怖攻擊事件發生後，美國政府採取許多安全措施，自然限制人民部分自由），人民權利應受必要的限制，這是為保障國家社會安全及人民權利而限制，而即使如此，也需出自人民同意。一旦威脅的因素減少或消除，

政府就應恢復人民的基本權利，否則就形同極權或威權體制。

中國大陸自採取民主國家的市場經濟政策以來，經濟實力確也成為繼軍事威脅後的另一種「威脅」。但中共並不因自由經濟獲益而重視人民的自由與人權；相反的，為了維持其一黨專政的合法性，往往以「中國特色」為藉口對抗民主潮流的衝擊，並公開宣稱人權是國家主權範圍的事。避開西方意涵的人權而強調所謂的「人民生存權與發展權」，^{註四}一篇刊載於「人民日報」的專論仍強調：「人權本質上是一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反對將人權凌駕於國家主權之上」。^{註四}

5. 社會福利：謀求、增進國民的福利，是當代國家最重要的目的，前述四個目的只能算是消極的目的，而福利才是國家的積極目的。福利國家是指政府為人民解決一切生、老、病、死、殘、疾、就業以及提高人民的精神與物質的生活水準。故歐美各民主國家均以此作為進步的指標。歐美先進國家都有健全的社會福利或社會安全制度。而一國的福利制度與政策的良窳實與其政府分配資源能力與效率有關。若從全球化的觀點瞭解，當代政府堪稱「大有為政府」(big government)，國家支出佔國家收益的龐大比例，並雇用大批公務人員。國家的責任不再只是狹隘的經濟管理，還包括國內公民的安全與福利保障。^{註四}

由於福利制度對國家的經濟弱勢者或社會邊緣者具有「近利」的誘因，往昔各民主國家在重大選舉時，居於選票考量，即使明知國家財政已不堪負荷，政黨及政治人

註四 宋學文，「人權超越主權的世界趨勢」，中國時報（民國92年11月2日），A15版，時論廣場。

註四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人權發展50年」，新華月報，2000年，第3期，頁150。

註四 「人權本質上是一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人民日報（2005年7月13日），第9版。

註四 David Held, Anthony McGrew等著，沈宗瑞譯，全球化衝擊，（臺北：韋伯文化出版公司，2004年），頁561。

物亦不敢挑戰此一制度。惟自1979年英國保守黨以批判社會福利制度反贏得大選後，各國政要已不再視此制為選舉的「萬靈丹」。最近的實例是，2007年5月17日瑞典選民以選票推翻執政12年的中間偏左政府，在位十年、歐盟掌政第二久的總理裴瑞松將下臺；而以革新社福國大蠱，領導中間偏右聯盟勝選的溫和黨黨魁雷菲爾德將籌組新政府。此結果反映出選民對瑞典自豪的社福制度產生求變心態，因為高稅率、高福利的制度，讓太多失業族群有恃無恐太久了。^{註四}不過，亞洲新興民主國家包括我國在內，至今仍多以此做為選舉的法寶。

(三)外交能力

「外交」一詞古典的定義是指「兩個獨立的國家政府之間從事官方交往而運用的智謀與計謀」^{註五}。或認為外交係以和平方法處理國家間之事務；或認為外交為國家代表談判之學與術，以處理對外關係。^{註六}但隨著國際關係的變化，外交已趨向多元。雖然外交仍以國家為主體，但達成外交的目的的方式或手段卻是多元而富變化，而產生諸如非政府組織(NGOs)外交，草根外交，政黨外交等等。不過至今為止，傳統的國與國之間的正式的交往還是無可取代的關係；國家萬不得已才採取非正式以取代正式外交。這點說明我國即使遭受中共的國際圍堵，外交打壓，不得已以實質外交因應，但始終仍不放棄與他國正式邦交的拓展，原因即是如此。尤其當前我國外交的困境，因中共經濟與軍事等國力的崛起而更形嚴峻。中共不但在雙邊關係的國際的政治經濟及軍事層面，也在多邊關係的國際組上，全面破壞及排擠

我國，大量運用金錢及其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席位，拉攏各國以破壞及斷絕我國對外關係，企圖抹煞我存在的事實，迫我國屈服於其「一國兩制」之下的地方政府。

一國無論採行何種外交形式，外交運作的能量或成效就是外交的能力。外交能力是國家政治力的外顯力；而外交能力又稱外交力，它是以國家的實力為基礎。而外交力是軟國力的一種，它是從硬國力的延伸出來。換言之，一個國家若具備軍事經濟等硬實之力，較能發展其軟國力中的外交力。因此，「外交是內政的延長」的內政，在此應當成國家整體力量的總合。由於外交能力關係一國的存在價值，甚至被視為國家構成的要件。

孫子說：「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下攻城」。顯示孫子重視外交力甚於軍事力。此點從中國戰國時代的終結可以得到應證，在春秋時代經過無數攻伐後，已形七國鼎立局面。當時實力強大的秦國因政經實力遠超過其他六國，加上秦國地處戰略上易守難攻的要津，在謀士張儀遊說下採連橫戰略以圖一統天下。而六國為了自保，謀士蘇秦以六國之地五倍於秦，六國之兵十倍於秦，如果六國合為一體，同心協力抗秦必能滅秦的策略，遊說六國合縱對抗強秦。雙方都展開外交活動。雖然蘇秦的合縱策略在當時確實是六國抗秦的上策，但由於六國利害關係，各有不同，終因各國又以一己之利為基礎考量自己的外交政策，加上秦國以各種外交手段從中破壞，以致合縱盟約不久即瓦解。^{註七}而秦終滅六國統一中國。由此顯示，外交政策不僅關係一國的存亡，也影響

^{註四} 自由時報編譯魏國金／綜合斯德哥爾摩，17日外電報導。

^{註五} Theodore A. Coulombis, James H. Wolfe原著，白希譯，權利與正義——國際關係學導論（北京：華夏出版社，1990年，1版），頁158。

^{註六} 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第四冊，國際關係（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頁48。

^{註七} 柴宇球主編，優勢的外交謀略（臺北：文字復興有限公司，2001年，初版），頁90。

聯盟大戰略的成敗。

(四)國家的競爭力

國家競爭力受到重視與後冷戰時期全球各國從意識形態之爭轉入經濟競爭有關。尤其自1990年美國哈佛大學企管系教授波特(Michael Porter)的「國家競爭力優勢」(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一書問世，「國家競爭力」就成為學界跨科際的研究議題。

而國家的競爭力與政治力的關聯性，在於國家競爭力的強弱與一國領土的大小，或人口的多寡無直接關係；而在於一個有效率、有活力的政府能夠發揮全民的力量，以因應在政治、軍事、經濟及科技的快速變遷的國際社會。這種競爭顯示的意義是：第一、各國政府都以積極改善經濟人民生活爭取民眾支持，而舉世學者專家亦多以人民生活素質作為評估政府良窳的指標。第二、所有競爭力名列前矛的國家，大多是崇尚自由，尊重市場機能，強調自由經濟制度。^{註四}第三、這些競爭力表現卓越的國家，都具有相關的特殊文化，這種文化背後都有一組隱含的信念；它是與生俱來的，根深蒂固，埋藏於潛意識中。^{註五}

而所謂國家競爭力，是從人民生活水準，特別是經濟上的貧富，生存環境的品質，人均GDP等標準去衡量或比較國家整體的優劣。學者認為一個有效率的政府，健全的社會制度與優良的生活環境，都是一個具有國際競爭的國家所不可或缺的條件。^{註六}

對此「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與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MD)每年都會分別定期公佈世界主要國家的競爭力。其中WEF強調科技成長與經濟成長的競爭力；IMD則強調環境與永續成長的競爭力。雖然競爭力被許多經濟學家視為一個模糊的概念，但像WEF因這份報告是訪問9千家企業的結果，所以基本上可以被視為這些企業對一個國家經濟潛力的看法或評斷。^{註五}

雖然國家競爭力是以一國的經濟表現成果作為評量的基礎，但政府的領導與決策的品質才是幕後的推手。以WEF在2004-2005年所公佈的指標為例，顯示我國成長的競爭力在全球104個國家中的總排名雖由前一年的第5名上升到第4名，僅次於芬蘭、美國與瑞典。^{註五}此成績看似亮麗，然而公共政策的排名卻由前一年(2004年)的第21名下滑到去年(2005)的第27名。另外，再2006年IMD所公佈年度的「全球競爭力評比報告」中，臺灣的總排名由11名驟降為18名，中國大陸卻一舉上升12名，排名19名，緊跟在臺灣之後。在這份評比項目中，除了技術及科學基礎建設外，臺灣的排名全面退步。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臺灣的「政府效能」，從19名退到24名，大陸的「政府效能」卻進步到17名，已經「優於」臺灣政府的表現。此外，在「制度架構」與「商業立法」都從原來的第20名，退為第35及34。在此值得我們

註四 Charle Harpden-Turner, Alfon Trompenaars 著，徐聯恩譯，國家競爭力（臺北市：智庫文化有限公司，1995年，第1版），頁1。

註五 同註四，頁2-3。

註六 林祖嘉，臺灣國家競爭力：健康的科技技術與體弱的政府，「展望與探索」，第3卷6期，民國94年6月，頁10。

註五 張鐵志，「當競爭力名列前茅」，時論廣場，中國時報（民國93年10月19日），A15版。

註五 另根據WEF最新的公佈全球競爭力排行表，臺灣為第5名，勝過亞洲的對手新加坡（第6名）與日本（12名）。See Jonathan Adams, Taiwan's Crisis of Confidenc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uly/August 2006). p.29.

注意的是，在評比細目中，臺灣的政治不穩定風險、政府政策方向一致性及社會凝聚等，屬政府施政要務的三項目上，在61個被評比的經濟體中，排名是58名，這已算是倒數排名。^{註五}再看IMD的2007年世界各國競爭力評比指數，臺灣再度從17退居第18；相對於中國大陸，則從18進步到15。這也是在全球主要競爭力指標中，臺灣首度被中國大陸超越。IMD指出：臺灣表現最弱勢的在社會凝聚力、政治穩定性風險，及政府政策方向一致性等方面。表現的總結是：「民間表現前段班，政府表現後段班」。^{註六}由此可見，我國可能因政治轉型，政黨輪替的政爭內耗，致使政府與政策反成為我國競爭力阻力。^{註七}於此亦可看出，國家競爭力與政治力的關係。

不過，波特(Michael E. Porter)對政府的影響力，也就是政府制定政策的影響力，較持中性的看法。若從正面看，政府的角色應該是引導和充實鑽石體系的力量，並協助關鍵因素的升級。若從最廣義的層面觀察，政府最根本的角色是扮演訊息提供者，如此企業才能找出發展優先順序和察覺將面臨的挑戰，並展開競爭準備。^{註八}但若以國家競爭優勢為考量，就不應該過分強調和重視政

府的角色；如果政府的角色太重，會導致經濟向政治靠攏，企業將因退縮不前而失敗。

^{註九}換言之，政府政策的影響涉及決策品質與介入程度的拿捏分寸問題。譬如對日本而言，對具有國家競爭優勢的產業，政府的角色不但重要而且快速，這對日本早期成功的產業（鋼鐵、造船、縫紉機）等來說，日本政府的主導角色即具建設性。而韓國的政府在產業發展上亦扮演重要的角色，配合國內追求經濟發展的共識，韓國政府在教育等需要長期投資的領域保持穩定的政策；並在產業發展目標與提供相關資訊上，扮演重要角色。^{註十}

肆、結論：檢視我國政治力與優勢評估

從廣義看，政治力是國家整體能力放在國際社會的影響。也就是總體能力強弱決定一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即與他國的關係。或即所謂「外交是內政的延長」。但如從狹義看政治力，政治力是指一國內政與外交（或外交力）的整合力量。

從理論與實際看，我國並非弱國。就整體國力比較，我國與現今聯合國193個國家相比，至少排名在20名以內。^{註十一}若以上述

^{註五} 社論：該警惕臺灣競爭力的急速下跌了！中國時報（民國95年5月13日），A2版。

^{註六} 彭連漪，我競爭力首度輸大陸，中國時報（民國96年5月9日），A1版。

^{註七} 有關國家的競爭力與政府政策介入的利弊關係，學者有不同看法。不過，在提到90年代日本國力為何衰退，欲振乏力時，波特認為所謂政府模式是一大錯誤，政府的干預對日本經濟所造成的失敗多於成功。他說，被認為日本成功因素的政府模式，其實不曾在成功的日本產業扮演過任何重大角色，但是在許多失敗產業中，這種模式卻到處都是。見吳怡靜譯，「波特診斷日本經濟」，天下雜誌，1999年9月，頁252-4。

^{註八} Michael E. Porter著，李明軒、邱如美譯，國家競爭優勢（臺北市：天下文化出版社，1996年，1版），頁987。

^{註九} Michael E. Porter著，李明軒、邱如美譯，國家競爭優勢，頁989。

^{註十} Michael E. Porter著，李明軒、邱如美譯，國家競爭優勢，頁602，687。

^{註十一} 根據美國戰略學者克萊恩(Ray S. Cline)在1978年的「世界主要國家有感實力評估總分對比」表顯示，臺灣的排名序是12。其中以「戰略」(S)項的0.8，S+W項的0.9，及民心(W)一項的1.7最為亮麗，與以色列相近，但以色列當時的排名是18。此一數據所提出年代距今近30年，至今各國實力自然消長不一，故在未見到最新的數據時，採概括論述。見克萊恩「80年代世界權力趨勢及美國外交政策」（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2年），頁212-214。

「政治力體現」的各種指標檢證我國政治力。首先，在「政治文化」層面，除了「國家認同」一項因統獨之爭而影響社會凝聚力外，在「對政治與從政人物」，「對憲政的認知」，「因應政治次級文化政策」，「政治菁英的影響」等項，都已臻於成熟民主國家的水準。其次是「外顯的效應」的層面，在「政府的素質」一項，廉潔程度雖只夠上「中度」，但民主程度則是數一數二的；在「國家完成目標的能力」項，除了「國家安全」因長久處於中共的武力威脅，島內民心常處壓力外，國內秩序受轉型影響偶會紛亂，但大致上稱「亂中有序」；至於在司法（社會公道），人權，社會福利諸項目亦多在循序漸進。「外交能力」因涉及兩岸關係及國內統獨意識，尤其中共極力圍堵、打壓，使我國無法發揮正常國家的國際角色功能。至於「國家競爭力」我國長久以來受不利客觀條件的刺激，反而在政經方面力爭上游。因此在「國家競爭力」的總排名成績，都是亮麗的；雖然這兩年受國內政爭影響競爭力呈衰退跡象。故綜合言之，即令在外交能力上，我國這隻小蝦米受中國這條崛起的巨龍的脅迫，難與對岸分庭抗禮，但我國象徵軟國力的民主體制的政治力，對中共而言依然是佔優勢的。

也由於這種優勢，使一黨專政的中共產生合法性的危機，故不惜傾其國力在國際上封鎖、孤立、打壓我們。換言之，臺灣在軍事經濟上雖對中共不構成威脅，但在政治安全卻是；即臺灣的民主化變成中共政治安全的最大威脅。

環顧國際社會，過去與現在都不乏分裂

國家，但雙方在未統一前大多尚能相互包容（至少表面如此，如統一前的東西德、南北韓），而採諸如建立軍事互信機制，以及相互尊重各自的權限；至少不極力打壓對方外交生存空間。倘若再從政治或戰略文化因素探究，中共全力打壓臺灣的國際生存空間，看似與中共死抱傳統主權國家的舊思維，以及中國大一統或歷史上爭正統的戰略文化有關；但這僅是公開的民族主義的訴求，真正而潛在的驅力，則是前述的政治制度的堅持與維護；因為這是一黨專政的思想基礎。換言之，中共今日深知民主的普世不可違，只能祭出民族主義。因此，前者（民族主義）是名義上的，後者（政治制度）才是實質的。

我國前經濟部長江丙坤說：解決臺灣問題，重要的前提是兩岸和諧與政治穩定；假如這兩個做不到，民間投資不會增加，經濟就好不了。^{註卒}至於影響兩岸的和諧與政治穩定的最大因素，中共卻始終刻意地概括成為民族主義的統獨問題。其實以今日來看已是政治的民主與專制的選擇。關於這點，前蘇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忍尼辛，早在24年前即已指出：「中共所不能容忍的是你們經濟和社會的優勢，因為讓其他的中國人（指大陸同胞）知道沒有共產主義可能會生活得更好，那是不可以的。」^{註六}我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亦曾點出：今天中國之所以不能統一，不是如中共所指稱臺灣部分居民想脫離中國，…如果中國大陸實施自由民主的制度，經濟條件符合現代化水準，那有中國人不願見到自己國家統一呢？^{註空}龍應台一篇的專文亦有類似觀點：「海峽兩岸，哪裡是統一和獨立的對決？哪裡是社會主義和分離

註卒 紀碩鳴，「臺灣的問題是兩岸政治問題」，亞洲周刊（香港），2005年3月27日，頁21。

註六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忍尼辛先生訪華演講詞」，時間：民國71年10月23日，地點：臺北中山堂。

註空 臺海兩岸關係說明書，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中華民國83年7月，引自吳新興「整合理論與兩岸關係之研究」，附錄十五（臺北：五南出版公司，民國84年，初版），頁461-2。

主義的矛盾？對大部分的臺灣人而言，其實是一個生活方式的選擇，極其具體實實在在，一點不抽象。」^{註空}

處於全球化與經貿競爭取代軍事衝突的時代中，一個國家的政治領導者或政府的決策者，應十足認清自己國力的優勢與弱點；尤其與對手或敵人相較後，完全而客觀瞭解我方的優勢，才能藉機造勢，轉化優勢為權力。

我國面對崛起的中共，以領土廣大與人口眾多外加大成長的經濟優勢，持續壓縮我外交空間，孤立我國國際地位，我們不但不能接受「弱國無外交」的宿命論，更不能坐困愁城，反而要展現自己的政治優勢，也就是民主自由體制；雖然表面看來，中共經濟發展似已漸形成優勢，但就國家競爭力的人民生活素質的指標觀察，仍難與我相比。若就政府的廉潔或透明度比較，我國雖不如芬蘭、冰島、紐西蘭（我國在163個國家中排名34，中共為70），但我國已被全球公認民主國家，其相關指數甚至高過日本。這是因為防腐自清是民主的功能之一。

臺灣從政治威權轉型為民主憲政，雖以經濟發展為先行，但在關鍵時期以「協商式轉型」（或稱「寧靜革命」）成為民主政治；這是政經發展的成功之處。但如掌權者眷戀權位，始終維持威權體制，則政府腐化，社會貧富懸殊將成為難以避免的宿命。因此，兩岸的優劣對比，在政治是一個民主體系的臺灣V.S威權體制的中國大陸，從民主普世價值的客觀標準衡量，兩岸一邊已是高度民主體系，一邊卻依然維持舉世少見的一黨專政體制，雖然改革開放後的現今中國，儼然

已成為舉世注目的經濟巨龍，但所衍生的卻是經濟上的另一種不對稱：臺灣的均富V.S中國大陸的貧富懸殊；此問題中國大陸學者現已看出負面的效應；甚至懷疑鄧小平「讓部分人先富起來」政策的正確性。大陸學者馬建中指出：20多年來依此政策的實施過程中，導致出一比較嚴重的負面結果，是社會成員收入的貧富差距的過分拉大。而此這種貧富差距拉大的趨勢，倘得不到有效控制，必導致貧富過分懸殊和兩極分化，這將直接危害社會的穩定。^{註富}因此，這種以民主政治與價值所塑造的優勢，相對於中共，我國可能永遠領先；除非中共也跟進民主化，而這反而是我國以及全世界愛好民主和平人士所期待，甚或夢寐以求的美事。然而可能嗎？目前仍無跡可尋。但我們並不悲觀，若從政治發展理論與事實研析，中國大陸漸步入民主體制應是大勢所趨，亦為關心者所期待。

收件：96年04月15日

修正：96年09月15日

接受：96年09月20日

作者簡介

王榮川，國防大學軍事共同教學中心教授。

^{註空} 龍應台，「你不能不知道的臺灣——連宋訪大陸有感」，北京，中國青年報，2005年5月25日。中國時報（民國94年5月25日），A13。

^{註富} 馬建中，政治穩定論：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政治穩定問題研究（北京：中國社科學出版社2003年一版），頁162。